

隋唐五代的儒学



——前理学教育思想研究
程方平 著 ●●●●●
云南教育出版社 ●●

隋唐五代的儒學

周谷城題



(滇)新登字03号

责任编辑：周鸣琦

封面设计：张永宁

隋唐五代的儒学

——前理学教育思想研究

程方平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字数：283,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415-0510-2/G·418 定价：4.85 元

序

多年以来，许多学者论中国学术的发展阶段，都标举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这固然有一定根据，事实上是不全面的。隋唐时代，固然佛教鼎盛，但是政治上和教育上的指导方针还是来自儒家；在政治和教育上，儒学仍居于主导地位。南北朝时代，南方经学与北方经学，学风不同。唐初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实现了经学的统一。隋唐时代，佛教名僧辈出；而儒学亦在演变之中。当时出现了“疑经”之风，突破了两汉经学的传统模式。韩愈倡言道统，排斥佛老，李翱提出“复性”之说，实开宋代理学的先河。柳宗元统合儒释，刘禹锡辨析天人，对于宋学亦有一定影响。应该承认，隋唐时代的儒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隋唐教育思想，作为中国教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程方平同志对于隋唐五代儒学教育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钻研，写成《隋唐五代的儒学：前理学教育思想研究》一书，详细论述了颜之推、王通、孔颖达、韩愈、李翱、柳宗元以及张弧、林慎思、皮日休等的教育思想及其社会影响，说明了隋唐儒学教育思想的特点以及儒学与佛道思想交互影响的关系；取材广博，充分调查了有关的历史资料；论证详明，对于有关问题进行了精细缜密的分析。对于颜之推、柳宗元、张弧、皮日休等人的论述，尤为深切，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程方平同志提出，隋唐儒学可谓“前理学时期”，我认为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新观

点，在学术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多年以来，在中国教育思想史研究中，隋唐一段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程方平同志这部著作把这一环节充实起来了。这是一项重要贡献。故乐为之序。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张岱年于北京大学

序 言

隋唐五代的儒家教育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儒家的教育思想不仅与佛道等思想发生了冲突和联系，也在“三教并存”、相反相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地自我调节，自我完善，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关键和深远的影响，是一个光彩夺目的历史篇章，是继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以来，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在魏晋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又一个思想活跃的历史时期。对此，过去的史论著作虽有涉及，但多失之简略，对魏晋南北朝动荡时期之后，儒学如何复兴，儒学与其他思想流派的教育思想有何差别，儒学在隋唐五代时期本身有何发展变化，它的影响、传播、主要内容等等问题，没有全面和详细地论述。因此，加强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分析研究，不仅有利于认识隋唐五代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也有助于对整个中国古代儒学思想的发展作比较全面、细致、系统、准确的了解。

长期以来，人们根据有限的史料去推测，认为隋唐五代时期是教育制度繁荣、教育思想贫乏的时期。和前面的汉魏南北朝比，与后来的宋明理学比，隋唐时期的儒学教育思想总显得苍白，没有丰富多彩的新概念、新思想和新方法，最多只是理学的准备时期，本书称“前理学时期”。其代表人物不过两三儒者，如韩愈、柳宗元、李翱等而已。人们的这些分析与推测是不准确、不全面的，既没有从儒家教育思想发展的总过程中去分析

隋唐五代儒学教育思想的地位，通过梳理儒、佛、道三家教育思想的内容和关系，深入挖掘当时教育思想的丰富内容和宝贵遗产，也没有从隋唐五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宗教、社会等多种角度作全面地考察，分析当时教育思想赖以建立的多方面的基础，更没有从本质上分析教育制度发展和教育思想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是用现代人理解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去硬套历史上的教育制度和思想，孤立地分析其制度和思想各自的发展，因此，在许多方面得不到满意的结论。

隋唐五代是一个相当长的、有一定内在关系的历史时期，在教育制度上有一个从兴到衰的过程，而在思想上则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教育思想的表现不是一两个教育家的文集和文章所能概括的，它是通过一个历史时期的政策、法令、社会舆论、教派论战、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经典注释、民俗民情，以及民族交往等等来全面表现的。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经济、政治、教育高度发达的时期。中国是当时东亚文化、教育圈的中心，中国人民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将自己的伟大发明和创造无私地奉献给世界各国人民，这不仅包括造纸术、印刷术、炼丹术（包括化学、药学等）、文学、艺术、丝绸、陶瓷等等，还包括了许多可贵的教育思想和系统完整的教育制度。在这些方面，中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在分析隋唐五代教育思想的发展时，若能结合当时丰富的背景材料，论述便会更加丰富生动，内容便会更加丰满充实。因此，在研究隋唐五代教育思想时，除了要广泛搜集和分析古籍史料而外，还要认真学习、分析和吸取后人研究隋唐五代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社会风俗、礼仪制度、宗教人物和典籍、国内外交流、考古文物、思想方法等方面的成果。不仅如此，还要上溯下联，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分析和研究隋唐时期教育思想的源与流，并进一步确定其历史地位。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魏晋南北朝及宋辽金元明诸朝和隋唐

五代的关系。由此可见，隋唐五代教育思想的研究既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课题，又是一个内容丰富、不易把握的课题。必须在详尽、全面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作广泛、深入、细致地分析。

一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文化高度发展的极其辉煌的时期。在学术上名家辈出，常有前无古人之作，在文史、思想、科学以及教育方面建树颇多。以经学而言，有刘焯、刘炫、牛弘、孔颖达、陆德明、马嘉运、贾公彦、啖助、颜师古、陆质等辈，以《五经正义》为突出代表。在史学上，有魏征、房玄龄、姚思廉、李百药、李延寿、令狐德棻、岑文本、温大雅、许敬宗、刘知几、杜佑等人，其所著《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等卷帙弘富，并有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备集唐朝及唐以前历朝典章制度。在法制上，隋朝的《开皇律》、《开皇令》、《大业律》、《大业令》，唐朝的《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即所谓“唐律”）都很完善，长孙无忌等人的《唐律疏议》为各朝之律宗，李隆基“御撰”的《唐六典》亦是唐朝政书的典范。在文学上，诗歌以李杜为泰斗，散文以韩愈为魁首，骈文以王、杨为伯仲，此外，尚有变文、传奇、词曲等等，历朝历代才子行列而出，呈百花吐艳之状。在艺术上，有书法名家僧智永、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欧阳询、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李邕、李阳冰、蔡有期、贺知章等人，其真、草、隶、篆作品多为后人师法；有画圣吴道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和张萱、周昉、韩滉、展子虔、李思训、王维、尉迟乙僧、荆浩、关仝、戴嵩、韩幹、曹霸、释巨然等人，画技日趋成熟，形成多种风格；在音乐方面，隋朝的九部曲、唐朝的十部乐兼容了国内外许多民族的优

秀音乐舞蹈传统。在科学上，有长于天文历法的耿询、付仁均、祖孝孙、甄权兄弟、李淳风、僧一行、梁令瓚、南宮说等人，制造了黄道游仪，测得了子午线，至少八次修改了历法；有长于数学的王孝通、韩延、李淳风和僧一行等人，《算学十经》的注释是当时的主要成果；在医学上，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是医学的集大成之作，苏敬等二十人新修的《唐本草》已记载药物达850种，藏医学在宇陀·云丹贡布的领导下完成了巨著《据悉》（又称《四部医典》、《医方四续》），在农学上，陆龟蒙、严羽、侯白、李淳风等许多人都著有农书，涉及到园艺、植物、农具、兽医、相雨、养蚕等许多方面；在地理学方面，著名的有玄奘、李泰、贾耽和李吉甫等，以《大唐西域记》、《括地志》、《九州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海内华夷图》、《元和郡县志》等为代表，并已出现比例尺和分色绘制等先进方法；在建筑上，何稠、宇文恺、李春、阎立德等人及其世家是较突出的，其不朽之作是长安城、赵州桥、帝王陵墓、数千所寺院道观以及帝王出征巡视时候所需的住所与设施。除此以外，在印刷术、造船、制陶、测量、石油利用、冶炼、工艺等方面，隋唐时亦有长足的进步，表现出当时科学文化综合发展，齐头并进的形势。仅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朝已有地理、农家、天文历算、医学等方面的著者468人，有关著作达8218卷，在世界科学史上是极其惊人的。

中国在上述各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不仅为当时的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资料，还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使中国成为当时东方文化教育的中心，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在这一伟大的、综合发展的文化背景中，隋唐五代的教育有了惊人的发展，在制度、教材、教法、考试、用人等方面均有建树。如有经学教材《五经正义》，科学教材《算学十经》、《本草》、《甲乙脉经》等，文字教材《说文解字》、《字林》，写

作教材《初学记》、《文选》，玄学教材《道德经》、《庄子》、《列子》、《文子》等注本，蒙养教材《千字文》、《太公家教》、《兔园册》、《蒙求》等；在教学实践中，人们采用贴经、墨义、记诵、写作，以及实验、调查、游学、论辨等多种教法和详细规定的教学管理制度。在教育思想上，虽然官方一直以儒家学说为主导，但来自佛教、道教、文学、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民俗等方面的冲击却如潮水阵阵袭来，引导人们在社会发展的现实面前重新考虑传统儒家思想中提出的问题，促使其更新和发展。因此，在分析隋唐五代儒家教育思想时，首先要从儒佛道三者的关系上分析和考虑，把握住这一关键之处和大的氛围，而不是把儒、佛、道三家割裂开来分析，看不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共性与个性的特点等。其次，要从基本史料和原著入手，深入体会当时各家思想与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之间的关系。第三，应从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因为当时不可能有很专门的教育家和严格分类意义上的教育思想。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的教育思想，往往散见于众多的典籍，甚至弥漫于社会舆论和社会风气之中。因此，要善于把握和分析微观与宏观，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通过一叶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同时，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分析个别人物及其思想，使论证更为可靠。第四，要把隋唐五代儒家教育思想的发展看作一个完整的过程，即在魏晋南北朝玄学和宋明理学之间的一个典型的儒学发展阶段。在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前理学时期”的儒家教育思想。过去，谈隋唐儒学只是注重韩愈、柳宗元和李翱等，认为儒学的振兴和改革由此三人为代表，然而，此三者均为中唐以后人，对在此之前儒学的发展，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韩柳李三人的思想源流等，均没有令人满意的论述，使分析研究显得孤立和肤浅。第五，在分析时要注意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借鉴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传播学、宗教学、史学、科学技术、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经学、文

化学等的知识和方法。这样，在分析时可以有意识地从多种角度观察问题，找出儒学发展中某些带规律的东西。

二

既要作隋唐五代儒学教育思想的文章，那么首先就要弄清什么是儒学。随着儒文化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长期以来的某些专门研究在儒学概念的确定上是含糊不清的。有的将其与孔学、经学等同起来，有的认为是除佛道以外的一切中国文化的学术表现形式，甚至把它看作是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因此，有必要在进入正文之前，做一些必要的限定和正名。

考《周礼·大宰》，知“儒以道得民”。儒字古义为“有六艺以教民者”。汉代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指》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其子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亦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据《汉书·艺文志》载：“（儒）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都说明儒是以六经六艺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而并非偏于经或偏于艺。在本世纪初，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曾著《原儒》一文，指出“儒”是泛指术士和那些以礼、乐、射、御、书、数“教民”的知识分子，其概念名称在孔子以前就已存在。到孔子授徒著书自称为儒以后，儒的概念才缩小为“私名”，成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的一派学者的专称”。^①其后，著名学者胡适亦作《说儒》一文，发挥章太炎此说。主要是强调儒学决不限于专门研究孔子本人思想、主张、道德、伦理的所谓“孔学”，也不限于作为汉以后统治学说的经学（包括《五经》及其注疏等）。自孔子正式建立儒家学派以后，先有孟轲、荀况两大

^①参看《国故论衡》东京秀光社庚戌年（1905年）版。第151—155页。

学派直承孔子，到战国之时已经“儒分有八”，^①到秦汉时期自称儒家的已有十五派。^②自东汉而下，因道教的发展和佛教的传入，一切非佛道的学说多自称儒学，所以，儒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与孔学、经学不能划等号。孔学与经学只是儒学的组成部分，儒学则是以孔学、经学为中心，包容量很广、很大的思想文化学术体系。

从儒学的内容看，自它创立时起，其所传授的内容就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儒学的师祖孔子也以“多艺”闻名。在儒学的发展中，一方面要吸收大量有益的学科内容来充实和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又要在与其他学派的争论和辨驳中取长补短。逐渐地，在传授经学的同时，文学、史学、语言学、法学、医药学（包括兽医等）、律学、天文历法学、算学、书学（包括绘画工艺等）等学科也进入儒学教育体系，使儒学体系扩大、内容弘富，可以与掌握内外丹术和无为思想的道教、掌握“五明”之学^③的佛教抗衡，在学术和思想界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在研究儒学教育之时，不能只考察经学，还要涉及文学、史学、语言学、音韵学、训诂学、自然科学、法学等等，从广泛的文化背景和众多的学科中分析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地位。这样，结论才会更加可靠，论证才能以理服人。隋唐五代之时，儒学中最有影响的首要文学与经学，其次是史学和其他学科。虽然经学是官方的教材和科举考试的主要项目，但文学、史学等的发展并不比经学逊色，相反地要大大超过经学。如果在分析隋唐五代的儒学时，只顾及经学而忽视其他，便会犯以偏盖全的错误。韩愈在中唐以后特别强调“文以载道”，唐代科举中以文学出身的进

① 《韩非子·显学》

② 参见《礼记·儒行》，其中记有“十五儒”。

③ 参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及石村著《因明述要》

士要远远超过明经，而且地位也高，就是文学昌盛，经学衰弱的证据。

至于儒学内部的争论和变化，这是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梁启超曾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和《清代学术概论》二文中指出：“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理性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他认为，因此孔子才会渐变为董仲舒、何休，变成马融、郑玄，以及韩柳、程朱、陆王等等。梁启超此说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儒学发展的历史情况，肯定了儒学内部争论变化的合理性，也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儒学中虽有各家各派，有师承门第之别，但所涉及和关心的问题却是儒学的根本问题。

汉唐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发展的高度繁荣时期，也是中国历史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两段时间里，无论是在物质建设还是在精神建设中，其基调都是积极进取的，风格都是兼容开放的，内容都是色彩斑斓的，充满了“英雄时代”的精神和自信心。即便是儒者学士也不以弃旧图新为非，不以讳言功利为是，在继承、整理和吸收传统文化的同时，既确定了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学说——儒学思想体系，又能吸取异说别派的思想方法，使自身充满了活力。在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之中，整个汉唐的文化教育基本上是在“儒文化圈”中进行的。不仅为中央到地方的官学教育体系从形式和内容上提供了保证，在广大民间中长期积淀的儒家思想意识更是其广泛的社会基础。虽然，唐朝曾设崇玄学以发展道教教育，佛教势力也很强大，但广大文人学者多为仕途奔走，被科举所误，禁锢于儒家经典而不能自拔。虽受些佛道影响，著有离经叛道的诗文，但尊圣崇贤，为国效力之心不死，这在大量的论文之中可以看到。由此可见，隋唐五代之际，儒学在形式上的主导地位的确有利于它与佛道两教教育思想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在广泛的领域中进行的，而不仅仅限于经学。因此，在研

究隋唐儒学时，眼界必须要进一步打开，跳出传统研究的窠臼，在广泛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在佛道儒三教争斗的大背景下，在广阔的文化领域中展开隋唐儒学，即“前理学时期”儒学教育思想的历史画卷，可能会收到较之前人的研究更有新义的效果。

到隋唐之时，儒学的概念已不仅仅是指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不单纯以《五经》为教材，以“六艺”为实践，是在传统儒家基本精神和宗旨允许的范围内扩大和丰富，形成广义的儒学领域。儒学在基本立场上仍恪守尊孔忠君、治世强国、修身齐家、格物致知的基本原则，将有利于国计民生和自身发展的经、史、文、法、农、医、天、算等等内容均纳入自己的体系，并注意吸收佛道各家之长。不仅后世的大多数儒家学者没有盲目从古，自我封闭，就是在传统儒学经典中，也处处可以看到发展和兼容的痕迹。如《诗经·大雅》有“周虽旧都，其命维新”的说法。《周易·乾卦》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革卦》中又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等有见地的认识。到孔子后人著《礼记·大学》，则在卷首征引商代铜盘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至汉代，儒学发生重大变化，董仲舒明确指出：“圣王之治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修复教化而崇起之”。“行政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更化则可以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祿日来”。^①可见儒学本身是在动态的发展中变化，内容也在丰富和充实。只以“六经”、“六艺”来范围儒学，不可能深入了解儒学的内在精神。孔子治学时能够“不耻下问”，^②有多才多艺的良好素质，知识是开放型的。宋儒王安石也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论语·公冶长》

夫女工，无所不问”，才能“知其大体而无疑”。^①经学无疑是儒学的核心，但不是儒学的全部，因此，在研究隋唐儒学教育思想时，必须以经学为主，兼及其他，把儒学视为一个广阔的领域，而非一个单独的学科和流派。

三

隋唐五代儒学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就象其在整个儒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一样。由于隋朝、初唐、中唐、晚唐和五代儒学面临的具体问题各不相同，因此，其发展方向、主要内容、争论的焦点等等也各有侧重。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经学史、文学史、思想史（包括哲学、伦理和宗教等）、教育制度史等作了不少工作，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则因为过于简略而线索不清。隋唐五代的儒家教育思想史基本上都写成韩愈、柳宗元、李翱等几位中唐教育家评传，虽然近年来的研究扩展到王通和孔颖达等人，但儒家发展线索仍然不清，涉及内容也仍然过窄，不能很恰当地揭示这一历史时期儒学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状况及其特点。

笔者认为，梳理和分析隋唐五代儒家教育思想的阶段性情况和特点，是研究隋唐儒学教育思想的基础，其中不仅包括许多史料工作，也涉及研究的方法问题。即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中比较充分和细致地展示儒学教育思想发展的具体进程，以及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耗散结构理论的方法等对隋唐五代儒学教育的具体问题进行评述。从纵的和横的两个方面揭示隋唐五代儒学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概况和基本特点。

关于隋唐五代儒学的历史分期，历史学、文学史、政治学史

^① 《王临川集·答曾子固书》

等都有所建树，经学史及教育制度史的分期简略而不甚明确，而且偏重于初唐。1953年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发表了他的专著《唐代教育史的研究：日本学校教育的源流》，将唐代教育制度及其文教政策和思想的发展分成初唐、中唐和晚唐三个阶段。他虽然没有着重分析儒学教育思想，而且没有兼顾隋朝及五代，但在史料整理和编写安排等方面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由于隋唐五代儒学教育受经济、政治、文化、学术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大，所以根据唐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状况来划分儒学教育的阶段亦有可取之处。本文将唐朝儒学的发展也分为三个阶段，上承隋朝，下接五代。初唐从李渊建唐到唐玄宗天宝14年（755），即“安史之乱”暴发的年代，史家称作“盛唐”时期；中唐从肃宗至德元年（756）至武宗会昌六年（846），是唐朝衰落和“中兴”时期；宣宗大中元年（847）至唐朝灭亡为晚唐，是社会动乱，唐王朝苟延残喘，直至最后消亡的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注重世事，以天下为已任的儒学必然在许多方面出现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隋唐五代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外部联系，也可充分表现儒学内部的争论、改革及变化。一个时代或历史阶段的教育思想是这个时代或历史阶段基本矛盾和问题的反映，它与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的发展变化有一定的距离，其活跃程度较之后者更强，因此，阶段性特点也就更明显。当然，这样分阶段只是个粗浅的尝试，虽有便于搜集史料，把握内外矛盾关系等长处，但还有待于继续深入地分析思考。

历史阶段的划分不仅有自身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及有关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使研究者很容易发现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和空白点。根据这一阶段划分限定，本书着重在隋唐之际及唐末五代进行了大量的史料挖掘，而对于过去人们重点研究的中唐时期，则只突出地分析主要教育思想家的特点，并有意识地变换角度，在三教论辩和斗争的过程中寻找其发展和变异的契机，试

图有别于前人。

当然，隋唐五代的儒学教育横跨近400年的历史，内容极为庞杂，又时有变化；加之笔者才疏学浅，难免挂一漏万，甚至有错谬之处，希望专家学者给予多方指教。